

“东突”神话的历史迷误

董玉洁

曾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的
一批批突厥人是谁

“斯坦”，对这个名称，中国人并不陌生。这是个源自古波斯语的后缀，意为“某人生活的地方”，从南亚到西亚被普遍使用。

那么，“东突厥斯坦”又是什么？

突厥，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几千年间，在中国内地以北的广阔草原上，曾如走马灯般一拨拨地兴起和衰落过许多游牧民族。突厥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曾在历史上书写过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那么，历史上曾经纵横捭阖的突厥人，与“东突”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家，有什么关系吗？

在唐朝经过30年的战争先后消灭东、西突厥汗国后，中国史籍中关于突厥的记载逐渐平息。但

是不久之后，在中亚、西亚、欧洲，在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廷人以及后来西方人的史籍中，却有一批批的突厥部落纵横驰骋在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大地上，一次次地发动进攻，一次次地建立帝国，一次次地失败，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把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搅得天翻地覆。

那么，这些突厥人是谁？他们是遭到唐朝打击之后向西迁徙的突厥人吗？

遭到唐代打击迁到中亚以后，突厥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亚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民族众多，各种文明相互交错，而且自古以来存在着许多文明古国，突厥人不得不与当地居民居住在一起，彼此混杂融合，其社会结构很快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此后活跃在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所谓突厥人，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同一个民族集团，其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

少得多，如果不这样，那我们党领导谁呢？

在党领导政权这个问题上，谢觉哉提出当时情况下要避免四种倾向。一是避免不顾实际情况在政权机关中党员一定要占多数。因为实现党的领导不是仅仅依靠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占多数。“党员在政权中、民意机关中，多几个与少几个还是次要。”二是避免放弃党的领导，以为实行民主，党就不要管了，这也是要不得的。三是避免把命令当领导。领导带有命令性，但不是命令。四是避免用领导党员的方式去领导非党人士。他认为，只有用民主的方式把各类群体的人们都团结在我们周围，共同办事，这才是真正的领导。

随着革命政权的逐渐扩大，谢觉哉结合自己的实践，在1942年5月边区参议会后又提出过党政分开的建议，主张通过重要决策和党员的模范行动来体现党的领导，而各级党委不必过多地干预行政工作，以避免产生以党代政，从而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1944年12月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后，谢觉哉又写信向毛泽东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

代表会议。毛泽东回复说：“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会有好影响的。”又说：“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遵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谢觉哉在贯彻中再次具体地提出，在政权中，要避免过去党政会议不分，把政府的会当作党的会，党的话拿到政府上说的现象。

可见，在谢觉哉的上述论述中，一方面，党政工作作为党和人民的整体事业，“本来不可分”，要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执行党的统一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党政两方面又担负不同的具体工作职能，“必然要有分”。笔者认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搞好党政两方面的具体工作职能分工，防止以党代政现象的发生，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现在和今后，这始终都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不断加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

（摘自7月21日、8月3日 上海基层党建网）

都在发生变化,只是因为他们都讲着这样那样的突厥语言,才会被人们统称做突厥人。

他们在西迁的过程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几百年时间里在中亚翻云覆雨,相继建立过若干政权;在阿拉伯帝国内部上下其手,四面出击,大败拜占庭军队,抵御十字军入侵。14世纪后半期,具有突厥人和蒙古人双重血统、杀人如麻的帖木儿在中亚登上历史舞台。帖木儿帝国不久就灭亡了,但他的后代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了功业。1526年,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打败印度的十万大军,以蒙古人后裔的名义建立强大的莫卧尔帝国,直到1858年被英国殖民当局废除。

而突厥人的另一支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对欧洲发出死亡威胁。早在14世纪中期,整个小亚细亚都已处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接着他们进入欧洲,对欧洲人不断取得军事胜利,并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千年帝国拜占庭就此灭亡。然后他们渡过多瑙河、击败匈牙利,围攻维也纳,对欧洲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巨大压力。这个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在欧亚大陆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争夺它的遗产曾是欧洲列强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战后帝国解体,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但帝国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中东和东南欧等地的民族、领土、宗教等问题上一再表现出来。

从这些纷杂的历史上可以看到,突厥汗国在唐朝打击下灭亡后,尽管一批批操突厥语的民族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留下不灭的影响,但突厥后裔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所有突厥人组成的统一国家”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

中国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的吴宏伟指出,把生活在欧亚大陆上一批不同民族部落或部族的人统称“突厥人”的应该首先是阿拉伯人。当阿拉伯人在征服这些地区的部落、部族或民族时,面对一个个从没见过、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共同特点的群体,无法将他们互相区别开来,只好把他们统统称作“突厥人”,把他们居住和活动的地方称作“突厥斯坦”。阿拉伯人的这种称呼逐渐为其他一些民族所接受,成为习惯沿用下来。

后来,使“突厥人”这个指称所指代的对象不断扩大,并真正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的,在

相当程度上来说,是18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家。他们把这样一批从历史上看可能有共同来源、或是发生过密切接触关系的语言群体,划归为阿尔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称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吴宏伟写道,按突厥语言学家的一般说法,全语族包括了30余种语言,主要有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阿尔泰语、土耳其语等。与此相适应,现在正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都应该算作突厥各民族。

吴宏伟指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蒙古等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人口超过一亿。

中国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裕固、撒拉、塔塔尔以及新疆蒙古族中的一部分,人口近千万。这些民族的形成时间各不相同。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唐朝时被称作回纥或回鹘,起初臣服于突厥,8世纪推翻突厥统治者建立政权,疆域广大,国势日盛,还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被所属黠戛斯所灭。亡国后的回鹘分三路西迁,其中一支迁到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另一支迁到帕米尔高原以西,称葱岭西回鹘。元朝时,回鹘与其他操突厥语的民族的长期融合已基本完成,他们的称谓也被汉文史籍称作委兀儿、畏兀儿、畏吾而、伟兀儿等等,14世纪皈依伊斯兰教。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统一了天山南北,在把天山南疆仍称为“西域”的同时,也开始把这一地区称为“新疆”。此时,“维吾尔”作为一个民族最新的名称开始出现在行文当中。

古代维吾尔人继承了古突厥的文字,后受到其他语言影响逐步改进,198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全面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东突”名称的由来

既然古老的突厥族今天只存在于历史的册页中,那么“东突厥斯坦”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率先使用“突厥

斯坦”一词,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不同,为叙述的方便,他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同时称为“中国突厥斯坦”。随后西方间或有人使用“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19世纪中期,俄国兼并了中亚三个古老的汗国,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称中亚河中地区为“俄属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

俄国人提出的这一名词明显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目的是为西方列强划分利益区提供方便。沙俄的这一行为在中国身上划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从20世纪30年代起,此称呼开始成为东突分子进行民族分裂的工具。

泛突厥主义:一种陈腐的滥调

东突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毒瘤,它有着深刻的移植历史,其思想根植于19~20世纪初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简称“双泛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潮,它强调全世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不分民族和国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由哈里发统一领导的伊斯兰教国家,以反抗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统治,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18世纪后,奥斯曼帝国苏丹把在伊斯兰世界已经废弃了几百年的哈里发的桂冠戴到自己头上,表明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威,既为麻痹境内被压迫的穆斯林各族,也为争取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以对抗欧洲列强的欺凌。

而泛突厥主义(大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这是当时一些突厥语族知识分子提出的概念,本来具有号召受俄国压迫的各突厥语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压迫的意义。其创始人是克里米亚贵族伊斯马依勒·普林斯基(1815年~1914年),他被称为“泛突厥主义之父”。20世纪初期,在俄国沙皇政权迫害下,泛突厥运动领导人纷纷逃亡土耳其,开始了在土耳其的发展发酵期。

“东突”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初期,双泛主义开始向我国新疆地区

传播。有一些从事境外贸易的商人和出国留学人员,接触到了双泛思想,便将这些思想带到新疆。1913年,一些喀什的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当地的负责传播双泛思想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答应向新疆地区派出专门的教师。辛亥革命后,新疆省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新疆传播双泛思想,所以一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双泛思想散布人员以“办教育”为名进入新疆,后遭到新疆地方政府驱逐。

30年代,新疆各类矛盾激化,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在英国支持下,1932年初,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和田、喀什等地进行了猖狂的分裂活动,先在和田成立了和田伊斯兰政府、“和田艾米尔政府”,伊敏自称为“艾米尔(即国王)”,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和宗教领袖。1933年11月12日,伊敏等人在喀什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一政权由和加尼牙孜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为国务总理。在此期间,他们还提出“灭黄汉黑回”的主张,鼓吹“东突厥斯坦乃东突厥斯坦人之东突厥斯坦,无须外人来作吾人之父母”,叫嚣“将外人永远驱逐出境”,激化民族仇恨。1934年2月6日,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部攻占喀什,“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昙花一现,归于失败。

伊敏外逃抵达克什米尔后,把该区的“新疆侨民旅居克什米尔同乡会”改名为“东突厥斯坦侨民联合会”。美国中情局积极插手,拍摄影片为其造势。为伪造历史,伊敏还写了一本被东突分裂分子奉为经典的《东突厥斯坦史》,鼓吹“东突民族”有近万年历史,其祖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

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组建临时政府。

新疆解放前夕,绝大部分“泛突”骨干逃亡境外,他们对共产党的民族和睦政策进行恶意攻击,并狂妄的声称要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战,为新疆局势的长久动荡埋下了祸根。

(摘自2009年第15期《世界知识》)